

收稿日期:2024-03-04

“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 图像叙事:困境与纾解

秦宁波,王丽娜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摘要:在“后真相”浪潮与视觉图像技术的双重挑战下,“有图有真相”这个曾被深信不疑的铁律一夜崩塌。“后真相”的滋生蔓延与图像谣言的肆意传播严重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构建。必须在认清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洞察“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所面临的风险挑战,牢牢把握图像编码、图像传输、图像解码的各个环节,实现对“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困境的“破局”。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4-008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23CDJ039)。

作者简介:秦宁波(1988—),男,山东昌乐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王丽娜(2000—),女,山东寿光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4.049

2004年,美国学者拉尔夫·凯伊斯首次完整提出“后真相”概念,将其表述为介于事实和谎言之间的“第三类陈词”。以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爆冷胜出”两大“黑天鹅”事件为标志,“后真相”一词迅速发酵并进入更加广泛的社会视野,在政治学、新闻传播、教育学等领域频繁“刷脸”。究其实质,“后真相”并非完全脱离事实真相,而是在媒介化社会环境中由舆论操控形成的基于事实却又偏离事实的“另类真相”,是极端主观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发展的产物,其突出特征是“情感优于理性、价值高于事实”。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助推下,“后真相”的出现与图像叙事的兴起实现了相互耦合,二者以感性与情感为纽带牢牢捆绑在一起。“后真相”以图像为叙事载体在网络空间和日常社会生活中肆意传播,真相逐渐被淹没在图像及视频的信息传播洪流中。这种现象正严重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构建。因此,要明晰“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运行机理和风险挑战,在此基础上为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提供新方法和新路径。

一、“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运行机理

视觉文化具有把本身非视觉性的事物视像化、直观化的显著特征,它通过图像叙事将“话语

的抽象思维逻辑转变为图像的观看认知逻辑”^[1],在视觉、听觉等多重感官的认知互动中实现图像信息的传递与共享。当下,图像叙事日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形式。图像叙事生产蕴含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化作品,通过隐喻机制、设境机制、浸润机制逐步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日常生活,最终在询唤机制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践行。

(一)以图传意:在视觉文化隐喻中映射主流意识形态意蕴

图像叙事所构建的主流意识形态视觉文化包含特定象征和隐喻逻辑。根据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理论,符号具有“能指”与“所指”两重因素,不仅呈现其本身的书写标志(能指),而且承载着从直接到间接再到抽象、具体的诸多意义和价值(所指)。视觉图像符号在经过充满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编码之后,其指向不再是图像本身这一表层“能指”,而是图像背后的文化隐喻(所指),这种文化隐喻包含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质言之,图像具有特定的象征和隐喻功能,即图像符号的指代性和暗示性。借助色彩、线条、形状、大小等建构的图像,能够从视觉机制上形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形式对应与意义关联,比如,“鸽子”象征“和平”、“天平”象征“正义”与“法治”、“镰刀”加“锤头”象征中国共产党。此外,世界各国国旗也承担着本国意识形态的象征和隐喻功能,国旗上的线条、颜色及图案背后都饱含意识形态的价值意蕴。五星红旗是我国的国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位置关系则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

图像作为“形而下之器”,在象征与隐喻中呈现观念、价值和喻义,即“形而上之道”。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念目标和价值意蕴通过图像以象征性、隐喻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观看者的思想和行为,以此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二)以图设境:在沉浸式交互中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空间

“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2]。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与空间中进行生产生活与实践活动,并与空间发生相互作用。就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而言,传统意识形态传播空间是泛政治化社会,其传播方式是由上而下的,即借助政治性国家机器的力量进行全民政治动员,在国家的宣传推动下,主流意识形态转化成一种标准再进行普及。因此,主流意识形态是在政治空间中以泛政治化的宏大叙事传播样态展开的,且是以一种“硬植入”的方式进行普及与传播的。这就容易导致意识形态变成一种虚无缥缈的符号存在于社会中却始终无法深入人心。“意识形态虽然属于理论领域,但其生命之根却孕育在日常生活世界”^[3]。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日益处于影像与符号的包围中”^[4],由大量图像与符号建立的视觉文化构成了当下的意识形态空间。互联网为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和视觉化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实践场域,也打破了以往自上而下的传播结构,推动了意识形态的“去中心化”传播。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图像叙事以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为特征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软植入”,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图像叙事能够创设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现实空间是指通过广播电影、宣传标语、建筑人像等文化设境的方式,以沉浸式渲染、交互式体验为基本特征,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特定社会环境和氛围。从道路两旁设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栏,到各个城市打造的区域性红色文化资源,它们在理论熏陶和亲身实践体验的双重机制下构建现实生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空间。此外,图像叙事本身具有设置和营造虚拟场景的特征,能够在观看者头脑中构建虚拟意识形态空间。虚拟空间并非实实在在存在的物理空间,却能够使千里之外的人们身处同一视觉时空,从中感受特定的精神力量。如:红色影视作品对历史事件的再现与还原,照片、短视频对疫情期间我国医护人员的真实刻画,同样能够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然而,图像既能够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空间,也可以制造异质思潮的传播空间,在“后真相”浪潮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双重加持下,互联网已

成为各类社会思潮的滥觞,图像谣言弥漫的网络环境对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空间的构建带来了严峻挑战。

(三)以图激趣:在视觉消费中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生活性渗透

在现代社会中,消费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人们往往通过消费切实感受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并在获取自身满足的同时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随着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追求,以视觉为导向的消费者行为即视觉消费逐渐上升为人们的生活主流消费模式。不同于传统消费观念以追求商品本身的实用价值为主,视觉消费更加趋向于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商品所蕴含的象征性符号意义及外在表征甚至变成了引发人们消费意愿的首要考虑因素。

主流意识形态借助视觉消费的途径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下,诸多热播主旋律影视剧的涌现形成了壮观的主流意识形态视觉文化景观。主流意识形态视觉文化作品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达,饱满细腻的人物刻画,精美的服装、精致的化装和逼真的道具,真实再现社会生活。这种表现形式既迎合了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丰富了读图者感官体验的立体化审美过程,又打破了以往宏大的政治叙事场景,使主流价值观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直达人的内心深处。在移动互联网的助推下,以影视资料为主体的视觉化主流意识形态充满大众的工作与生活。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短视频平台的火爆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动新型消费模式的发展。主流意识形态日益打破其神秘性、抽象性,逐渐平民化、普及化、生活化,成为可观、可感、可知的真实存在。外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动员及规训在视觉消费中日益转化成人们自身的生活方式,以此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活性渗透。然而,“后真相”时代的视觉消费极易在跟风逐利的市场运作模式下走向极端,导致视觉消费的异化。“后真相”生产者以视觉消费的叙事逻辑捏造客观事实,从而扭曲大众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四)以图促行:在主体询唤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接受与认同

询唤即召唤、质询之意,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出,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询唤个体使之成为主体,二是使个体屈从于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5]。质言之,意识形态通过询唤或召唤使得个人从自由个体转变为意识形态主体,从而接受并服务于意识形态实践。例如,意识形态利用影视作品对主体进行询唤,影视作品通过丰富的表现形式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促使人们将意义引入其中,从而使影视作品的主旨价值深入人心。从几年前热播的《人民的名义》到此前爆火的《狂飙》,这类以打击贪污腐败为主题,彰显主流价值观的电视剧在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的同时,也发挥着意识形态的询唤功能。电视剧《狂飙》中以高启强为首的黑社会团伙的覆灭和以安欣为代表的正义力量的胜利,显然隐喻着这样一个主题:邪恶必将被正义剿灭。这类主旋律影视剧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旨归,在观影过程中,正义价值观凭借视觉图像或感性形象不断对观看者进行召唤,观看者在共情和构建主体幻想中逐渐实现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并自愿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从而最终达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践行。

二、“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现实困境

“后真相”时代,在社交媒介平台和视觉图像技术的加持下,图像出现日益“失真”现象。“失真”的图像成为“后真相”的传播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后真相”的生动性、感染力和可信度,从而在无形中对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表意机制、浸润机制、渗透机制、询唤机制形成了严重冲击。从受众角度、传输角度、内容角度来看,“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构建存在

诸多潜在挑战。

(一)感性桎梏淹没主流意识形态原生语义

从受众角度看,在“后真相”时代的社会环境与图像叙事方式的双重作用下,容易诱发社会公众感性优于理性、情感高于事实的心理,从而戴上感性的桎梏。过度感性和非理性化容易弱化甚至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表意机制和询唤功能。

一方面,“后真相”以情感煽动主导舆论。“后真相”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主观性占据价值判断高峰,即价值判断建立在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基础之上,并能够产生比客观事实更加强大和深远的影响力。当事实真相难以辨认或模糊不清时,客观事实常常被个人情感取而代之。甚至在某些场域中,人们在“真相”和“立场”之间更倾向于与自己立场观点相符合的信息,“相信我所相信的”。当情感上的共鸣引发先入为主的判断,加之受到媒体舆论的煽动与诱导,理性与感性自由博弈的讨论就逐渐演化为一边倒式的极力支持,真相在群众高昂的情绪下被漠视和掩盖。在药家鑫案件中,媒体舆论把事件主人公编造、渲染成“纨绔子弟”,贴上“富二代”标签,舆论谣言进一步调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导致主人公真实身份和事件发展的真实过程在舆论一边倒式的喊杀声中被淹没。这种价值判断中的情理倒叙极易使社会陷入“价值失序”状态,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价值目标陷入被质疑和解构的境地,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感性思维的传播和异质思潮的出现。视觉和图像具有直观、情感、理解的特点,人们对视觉图像的解读不是照镜子式的情景再现,而是充满个人认知和情感的重构。基于个体差异,不同人会因对相同的图像和影片产生不同的认识和感受,在“读图”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情感偏差与价值观错位的现象。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信息”变成了“我们想看到的信息”。受制于个体的认知水平和知识水平,部分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容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表意进行情感基础上的另类解读,形成价值判断中的情理倒叙。比如,电视剧《狂飙》播出结束后,高启强反而成为部分人的励志偶像。这种建立在个人情感和认知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与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视觉文化所承载的价值旨归被扭曲,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机制被打破。

“后真相”时代的受众群体具有明显的感性化、情绪化、主观化特征。在情绪本位下,“我所看到的信息”变成了“我想看到的信息”。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加剧了“后真相”时代非理性认识的扩散。图像所承载的“后真相”不仅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功能减弱,而且加强了异质思潮对社会大众的召唤与渗透。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原生语义容易在主观感受与情绪化思维本位中被淹没。

(二)图像谣言传播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从传输角度看,“后真相”在图像的裹挟下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于信息鱼龙混杂的互联网环境中,图像“谣言”搭乘互联网快车肆意生长是造成当下“后真相”泛滥的根源之一。互联网的“沦陷”不断挤占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空间和叙事场域,对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浸润机制构成严重威胁。

互联网为“图像谣言”的肆意传播提供了载体,促进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去中心化”传播。互联网将图像信息的创作权和解释权下放给大众,社会的信息传播主体不再完全是专业人员,而是为数众多的网民,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现状造就了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力量。这虽然满足了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主体性需求,然而也造成了图像谣言的肆意传播和另类解读。加之在图像已然被数字信息技术赋权的今天,各式各样图像处理技术的涌现使得图像本身愈加“失真”,许多

图像不再单纯地呈现事物原貌,而表现为经过整理、修改和重构之后的“人造真相”。美图修图软件、视频剪辑技术等出现,在无形中滋养了信息失实的土壤。过分美化、肆意修改、恶意剪辑图像使其面目全非,完全扭曲甚至丧失了图像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在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传播过程中,许多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视频影像大行其道。历史虚无主义势力为哗众取宠、迎合大众,制作有关历史事件的鬼畜视频、恶搞段子,凭借碎片杂糅的史料颠覆历史真相并篡改历史,在淹没历史事实和摧毁英雄伟人正统形象的同时,借助社交媒介以情感煽动非理性舆论冲击唯物史观的理性思维^[6],导致网络空间中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沉渣泛起。在国际社会中,图像谣言也成为国际力量博弈的杀手锏。西方民粹主义者作为“后真相”的生产者、拥护者和践行者,借助其媒体舆论优势,以美化自身和丑化我国为目标,利用电影、短视频、纪录片等方式向中国人民呈现颠倒是非、煽动情绪的内容,在美化西方民主模式的同时大肆贬低和污名化我国,“一党专政”“威权政体”“中国威胁论”等言论层出不穷。“后真相”在互联网的加持下肆意扩散,不仅冲击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而且严重威胁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此外,算法推荐技术容易导致信息同质化现象,促使主流意识形态被边缘化。在大数据时代,算法推送技术利用数据汇聚与数据推送,在满足无数个体个性化需求的同时,实现了信息的精准定制与精准发送。这种独特的信息传播模式实现了社会信息结构和传播秩序的重塑,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价值共识的生成提供了崭新的信息场景和媒介环境。然而,算法推荐技术依照个人喜好和兴趣“分配”给用户信息的模式容易导致受众个体的视野逐渐固化,出现信息同质化现象,形成“信息茧房”与“信息孤岛”,并进一步引发“回音室效应”。用户所接收的信息变成人们“想看到的信息”,这种夹杂个人感情所得来的“主观真相”和“片面真相”占据用户的社交网络,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难以突破圈层壁垒而日益被边缘化。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的互联网环境中,人们被各种虚假信息 and 异质思潮裹挟,在人造的虚假图像景观中立场丧失、意志麻木,从而质疑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旁落”。

(三)视觉消费异化扭曲主流意识形态意义建构

从内容角度看,“后真相”是大众文化消费的产物,借助“消费流行文化”将情感商品化后进行肆意消费、戏谑和解构。消费流行文化包含视觉文化,在视觉消费领域中,“后真相”与图像叙事实现了耦合,进而导致视觉消费异化。在视觉消费异化逻辑下,“后真相”的出现容易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庸俗化、平淡化、随意化、娱乐化,从而扭曲了主流意识形态意义建构。

异化视觉消费崇尚通过符号消费和物质占有构建身份认同,追逐通过感官刺激和精神享受获得短暂快感,从而导致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娱乐主义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视觉消费符号化导致功利主义盛行。由于商品的生产过程同时会伴随各种形态的图像生产,产品的外观设计、品牌标识、广告策划等都依赖图像,因此,图像逐渐被植入商品的符号价值,导致视觉消费符号化。视觉消费符号化使得符号价值在商品价值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符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商品本身的实际意义,人们把符号看作个人品味、身份以及社会地位的象征,从而心甘情愿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而非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进而产生“消费就是幸福”“消费体现身份”的异化消费观,凡勃伦效应即“名牌效应”应运而生。拿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带有LV标志的包的确要比普通包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毋庸置疑,“大牌”具有高品质、耐用等优点,然而在视觉消费异化之后,人们买的不再是包的品质,而是包的商标及其背后的身份地位象征。人们沉浸在图像赋予个体的包装“形象”之下,图像“霸权”不断入侵并腐蚀人们的思想,“商品拜物教”

逐渐演化为“图像拜物教”。在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中,视觉消费异化使人们越来越忽视图像背后的深层意义,更加关注其带来的功利性价值,众人沦为跟风、盲从的“乌合之众”而丧失其主体性。消费目的的纯粹功利化,颠覆了社会大众的人生信念与社会责任感,从而滑向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一端,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庸俗化。

另一方面,视觉消费异化导致娱乐主义盛行。借助大众传媒的垄断,“后真相”以迎合大众兴趣爱好、情绪欲望、情感体验为切入点,经过加工与包装,不遗余力地打造能吸引大众眼球和激发消费欲望的视觉文化产品。人们购买产品的欲望日益肤浅和片面,从而不断消解其背后的深层意义和价值。为了哗众取宠、迎合大众的视觉快感,大量形式与质量参差不齐的图像与影片涌现,甚至一些承载主流意识形态意义与价值的红色影片、短视频也沦为搞怪、戏谑、吸引大众眼球的流量段子。在短平快的生活节奏下,碎片化的浏览与阅读使人们沉浸在短视频娱乐与搞怪的氛围中,导致泛娱乐化文化现象的蔓延。在泛娱乐化生态下,以浅薄空洞的内容、戏剧性的表现方式呈现出来的图像更能够获取年轻人的青睐,文化由对社会生活的理性反思转变为对本能欲望的感官满足,图像成为人们获取视觉快感和释放压力的工具。这在无形中腐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场域,不仅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随意化、娱乐化,而且扭曲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建构,甚至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缺席或空场。

三、“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困境纾解

毋庸置疑,图像叙事已然成为数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新型叙事方式,这一趋势不可逆转。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过程中存在的潜在挑战,关键在于如何利用与引导。图像叙事要打破“后真相”的“致幻术”,就要统筹好图像编码、图像传输、图像解码各个环节,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动态运行过程的整体性把握,让图像能够真正反映真相、传达真相,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化传播。

(一)编码:完善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图像资源供给

“后真相”时代,图像谣言裹挟着似是而非的“事实”在互联网的助推下肆意传播,大量“失真”图像充斥社会公共领域。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需要明确图像选取的边界问题和选取原则,即并非所有图像均可用于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只有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积极正能量的图像,才能够被纳入选择范围。另一方面,还要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积极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图像资源库,充分完善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图像资源供给。

1. 坚守“真善美”统一的图像选取原则

现阶段,视觉图像信息呈现“爆炸式”增长的态势,流通于市面的视觉图像艺术作品层出不穷,但精品太少、次品太多,空有数量、缺乏质量。高质量的视觉图像产品应该是视觉审美艺术价值和道德教化功能的完美结合。具体而言,视觉图像理应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即“事实呈现、价值导向、审美体验”的有机统一。首先,图像要真实反映事件本身,坚决抵制过度美化、丑化、妖魔化等扭曲历史事实的图像。图像“失真”是“后真相”滋生的根源之一,可以选取能够展现同一事件的多种图像来保证图像的真实性,使之呈现完整的逻辑图像链条,并通过静态与动态、单一与系列等多种图像表现形式尽可能地真实再现事件原貌,达到图像“能指”与“所指”的有机统一。其次,图像要内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图像不仅要呈现泾渭分明的是非善恶界线,明确道德底线,严守法律红线,还要不断打磨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思想高度,合理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内容,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功能,在图像叙事过程中逐渐引导观众正确认知并实现

价值观塑造。最后,图像还要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但不宜过度娱乐化。审美趣味是每个人的正常心理需求,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既要给观众带来多重感官的立体化审美体验,又要严防过度渲染和过度包装。

2. 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图像资源库

文化是意识形态构建的土壤和根基,也是意识形态的外显符号和显著标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图像资源价值,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图像资源库,既有助于将体现中国价值的文化底蕴、人文精神熔铸于主流意识形态图像文本,又有助于充分激发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生动性、鲜活性。首先,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像资源和文化元素。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培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崇仁爱、尚和合、求大同的哲学思想,自强不息、扶正扬善、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以和为贵、兼容并包的价值观念,等等。要巧妙借助一定的载体,如借助“盘古开天”“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生动彰显中国古代人们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其次,推动中国革命实践和革命精神具象化、视觉化。要巧用中国革命实践的图像资源和文化元素,实现中国革命故事和革命精神的具象化、视觉化呈现。在图像叙事中坚持以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创作要求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创业”历史,刻画英雄伟人的光辉形象,生动再现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和革命精神。坚决杜绝图像信息中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以及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倾向。最后,依托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编织视觉图像。主流意识形态可以搭建生活化图像叙事空间,从人民大众的真实生活出发,构建真实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下人民群众生活现实的视觉作品。如将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或先进人物典型转化为可视可感的视觉图像资源,将其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

(二) 传输: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传播阵地建设

图像传输是连接图像编码与图像解码的桥梁和纽带,在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传播阵地建设,既要守好互联网这一意识形态传输的主阵地,又要抓好教育系统这一前沿阵地,坚持主阵地和前沿阵地两手抓。

1. 加强网络主阵地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7]必须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传播阵地建设,守好互联网意识形态主阵地。其一,要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监管,健全依法治理与正面引导体系。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加强对互联网网站的规范化治理力度,建立健全舆情监测体系,重点监测微信、微博、抖音等影响广泛的网络社交媒体,对于传播非法图片及视像资料的违规网站依法查办和取缔,对于短视频下面的煽动性、迷惑性评论进行依法追究,让谣言止于智者,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另一方面,要确保科学规范的视觉文化生产与传播路径,正面引导视觉文化向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向发展。要发挥政府主流媒体的带头模范作用,精心制作并大力宣传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视频,对于能够弘扬正能量的优质电影、媒体账号给予额外的流量和曝光度,同时进行官方推荐和专家点评,形成市场需求主导与政府正向引导的强大合力。

其二,优化算法推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推荐。习近平强调,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将算法贯穿于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等各个环节,提高舆论引导能力^[8]。必须打破

算法推荐机制的“数字囚笼”,优化算法推送技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推荐。一方面,构建算法推荐的价值引领机制,从源头上规避价值偏失风险。算法由算法推荐技术提供者设计和操控,因而算法推荐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在相当程度上是算法推荐技术提供者价值观的呈现。构建算法推荐的价值引领机制关键在于引导算法推荐者的价值观。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制定算法推荐服务的伦理与道德行为规范文件,以主流价值引导和规范算法推荐者的思想和行为,从而进一步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嵌入算法技术。算法推荐要在体现主流价值的内容范围内向用户推送其感兴趣的信息,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图像内容的推送。还可以进行算法推荐服务的考核与问责,对算法技术的潜在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估,使算法推荐者在考核问责压力下积极主动地以主流价值驾驭算法。另一方面,构建算法推荐技术的价值纠偏机制。算法推荐机制要在数据汇聚与数据推送过程中引入数据筛选环节,自动过滤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甚至有害的垃圾图像和信息,保证推送数据内容的积极正向和算法推荐技术的主流价值导向。此外,有关公司还要聘用专业、可靠、负责的人员对算法技术进行监管审核,取缔存在诱导用户违背法律法规和主流价值的算法模型,实现算法与监管人员共同把关、双重保障。

2. 加强教育前沿阵地建设

其一,要加强教育工作者队伍、教育内容建设。教育工作者作为图像信息的传播者,应该积极学习图像传播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的图像鉴别和筛选能力,根据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育条件等差异性选取图像内容、表现形式、传播方式。教育者还要具备一定的图像解读能力,通过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认知过程,透过图像的“真”和“美”,看到图像背后蕴含的“善”,从而在受众读图、识图的过程中进行正向引导,实现价值观塑造。此外,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受教育群体有计划地开展美学、图像学等教育。如针对学生群体开设音乐鉴赏、绘画鉴赏、视觉符号等专业性课程,针对普通群众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宣传媒介播放、宣传经典艺术作品。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央美院推出的特别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致力于使观众从美术经典中领略信仰之美。

其二,发挥高校思政课主渠道、主阵地作用。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要正确引导视觉消费。帮助学生了解消费的目的和本质,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视觉文化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观念,树立积极健康的合理消费观念,引导学生自觉抵制视觉文化功利主义、娱乐主义倾向,避免因过度追求感官享受而使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叙事走向庸俗化、平淡化和娱乐化,更加注重视觉图像所带来的精神层面的享受与体验,使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成为引领市场发展和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思政课堂作为传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针对网络视频图像中异质思潮对学生群体的侵袭,思政课教师要及时洞察学生的心理变化和心理诉求,以辩证思维把握学生群体的舆论导向,引导学生正向思维并及时纠正错误思想。可以结合社会热点和学生困惑的焦点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必要时还要开设针对性的主题讲座、主题班会等,对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和西方国家的抹黑、诋毁言论进行有力的回击,提高学生对不良社会思潮的判断能力和识别视觉欺骗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明晰图像背后之“善”,避免产生价值观错位现象,实现图像叙事的价值旨归。

(三)解码:培养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传播理性受众

“后真相”时代,视觉图像既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助推“后真相”肆意传播的重要工具。“碎片化真相”在视觉图像的包裹下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大多数缺乏高度的信息甄别能力和政治敏感性的群体,极易受到各种图像谣言的误导,从而对意识形态作出碎片

化的理解,导致其价值观念发生扭曲。因此,要实现图像的定向“解码”以引导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图像正确价值导向还要从受众本身出发,不断提高受众在“读图”之后的“识图”与“解图”的素养和能力,培养现代传播媒介环境下的理性受众,增强受众自身“解图”能力的内源性力量。

其一,科学把握图像信息,增强“识图”能力。随着技术权力的下放和“自媒体人”门槛的降低,短视频、直播、影像等已成为大众进行个性化表达的重要工具。人们身处图像泛滥的媒介环境中,面对各式各样的视觉图像信息,受众应理性看待,避免沉湎于图像的感性直观、娱乐性、虚拟性中而麻痹精神丧失思考能力。具体而言,受众要了解网络信息内容主体与生态链构成及网络媒体图像信息的传播规律与特点,既能够把握图像信息的“能指”,又能够洞察其“所指”;要以批判性思维对待传播媒介中的图像信息,积极运用自己的话语权进行理性表达,敢于批判、敢于质疑,否定扭曲事实真相的图像信息,敢于为正能量发声,不做思想保守者和大众迎合者;要秉持理性思考,提高判断能力,科学对待图像信息,避免陷入负面网络集群效应;要善于识别图像陷阱,能够快速高效地从图像信息超载的网络环境中捕捉积极有益的信息并服务于自身建设。

其二,培养辩证性思维,提高“解图”能力。“辩证性思维是从事物矛盾运动变化和相互联系中认识考察对象”^[9],这一思维方式有助于受众正确看待和深入分析海量图像信息,提高自身的“解图”能力。首先,受众要不断提升科学文化素养,拓宽视野。图像信息的观看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信息获取、选择、理解、吸收的动态过程。对于相同的图像信息,受众会产生多种不同的解读,这一方面是由于个人的立场、观点及思维方式的差异所致,另一方面,科学文化水平的高低也是造成差异性解读的重要原因。毋庸置疑,人的视觉体验与受众的理论储备有密切联系,如赫胥黎所言,你了解的越多,看到的就越多。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理论越多,视野越开阔,就越能够拥有透彻深刻的理解能力,从而能够更快速、精准地识别蕴含于图像信息底层的“善”的逻辑。因此,要提高受众的科学文化素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辩证思维能力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图像、解读图像的能力。其次,受众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善于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图像信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解图过程中将图像置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和世界大格局中进行战略考量,明确自身政治站位,善于透过图像的表面看清其内在实践本质。如对待历史影片或短视频中的历史片段,受众应从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出发,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理性考察与分析,不能陷入碎片化、主观性而随意截取图像信息中的只言片语,将本为内在有机统一的历史进程片面化理解为某些细微历史个案或尘埃的组合、拼凑,在无形中给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客观历史、侵蚀历史以可乘之机。

综上所述,“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在由文字叙事向图像叙事转型过程中面临“后真相”替代“真相”的危机。“后真相”的视觉化传播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0]如果任由误导正确价值立场的“后真相”传播下去,将会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必须高度重视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潜在风险,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把关、监管、引导,使图像成为传输真相和事实的载体,将图像谣言彻底曝光,构建风清气正的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环境,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扫清障碍。

参考文献

- [1] 周琪.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图像化构建[J]. 思想教育研究, 2016(10): 11 - 90.
- [2] 马克思. 资本论: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875.
- [3] 吴学琴. 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维度的意识形态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3.
- [4] 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刘精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105.

- [5] 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 陈越,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71.
- [6] 李腾凯.“后真相”时代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新变化及其应对[J]. 理论导刊,2020(12):57-63.
- [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8.
- [9] 张桂华. 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的哲学思维[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3(2):1-9.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mage Narrativ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Post-Truth” Era

QIN Ningbo, WANG Lina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dual challenges of the post-truth and image generation technology, the once convinced saying of “seeing is believing” became dubious overnight. The proliferation of post-truth and the rampant spread of fake images have seriously impaired the image narrative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mage narrative, we must confront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mage narrative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grasp the links of image encoding, transmission, and decoding, and achieve a breakthrough in the dilemma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mage narrative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Key words: “post-truth” era; mainstream ideology; image narrative

〔责任编辑:陈济平〕